

# 目 錄

面向新世紀——人本主義的對話 .....	1
2005 年 SGI 日紀念倡言	
通向新民眾時代的和平大道 .....	55
2006 年 SGI 日紀念倡言	
生命的變革——地球和平的路標 .....	101
2007 年 SGI 日紀念倡言	
以人性的宗教創建和平 .....	149
2008 年 SGI 日紀念倡言	
人道主義競爭——歷史的新潮流 .....	191
2009 年 SGI 日紀念倡言	
邁向新的價值創造時代 .....	231
2010 年 SGI 日紀念倡言	
奏響創造性的生命凱歌 .....	275
2011 年 SGI 日紀念倡言	
建設維護生命尊嚴的光輝世紀 .....	319
2012 年 SGI 日紀念倡言	

# 面向新世紀——人本主義的對話

2005 年 SGI 日紀念倡言

為了紀念 SGI (國際創價學會) 成立三十週年，在敘述我的感想的同時，我要提出為尋求世界和平及人類共生的確實可行方法及途徑。

首先，我要對這次在印尼蘇門答臘地震及海嘯中不幸喪生的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同時也對災民表示親切的慰問。

遭受這場罕見大災害的國家，在實現復興之中，不可或缺的是國際社會強力而持續的支援體制。我希望這種合作能夠進一步地加強。

我從心裏盼望復興事業得以順利進行，使災民能夠化悲痛為力量，早日恢復充滿希望及安定平穩的生活。

### **\* 安全保障優先政策**

自從 2001 年美國發生 911 恐怖活動以來，全球的緊張狀態一直不斷增加。為了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恐怖活動，眾多國家都把安全保障政策放在優先位置。

這種緊張狀態使市民日常生活的不安不尋常地擴大。雖然這種狀態與冷戰時代有相似之處，卻令人感到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威脅，原因是現在我們不僅看不清誰是敵人，同時也不知道甚麼時候會結束。正因為人們被這種無休止的不安困擾，所以無論我們採取怎樣的軍事行動或治安措施，都不能令人感到安心。

伊拉克的局勢仍然處於混亂狀態。雖然去年 (2004 年)

6月美國向臨時政府移交了主權，但是仍很難說在1月30日舉行的國民議會選舉能否成功。（國民議會選舉在1月30日順利舉行，有845.6萬名選民參加大選投票，佔登記選民58%，由什葉派宗教領袖西斯塔尼支援的政黨聯盟「伊拉克團結聯盟」獲得了超過407萬張選票，得票率約為47%）

除了這些問題外，中東和平的前景困難重重、北韓核武器開發問題的膠着，還有地域糾紛不斷發生等不安因素此起彼伏，令人擔憂「戰爭與暴力的二十世紀」將會重現。

另一方面，近年來許多國家不斷優先採取安全保障政策，使本來應該裁軍的地方卻出現擴軍的勢頭，治安問題優先於人權問題，貧困和破壞環境等其他全球性問題的對策再被推遲。可以說，為了預防恐怖活動，卻產生了另一個深刻地威脅人類生活和尊嚴的局面。

那麼，如何克服二十一世紀人類所面臨的危機呢？從根本上來說，沒有如同一揮魔杖就可解決問題的政策。相反，我們不得不承認前途非常險峻，我們面對的是如何不得不挺身抵抗蠻不講理的暴力難題。

儘管如此，我們也沒有必要陷入悲觀與絕望之中。只要是由人引起的問題，人就一定能用自己雙手來解決。無論要花多少時間，只要我們不放棄努力解決問題的信念，就一定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認為，關鍵就是我在以往的倡言中也提及的「對話」。

「對話才是和平的王道」——只要人類歷史不停地前進，人類就不得不永遠肩負這一命題。不管遭受多少冷嘲熱諷，到最後也不能放棄這吶喊。

我想先回顧一下二十年前我在倡言中引用詩人泰戈爾 (Tagore) 的話：「可能問不可能，你住在甚麼地方？不可能回答：我住在失去理想、無氣力的人的夢中。」(《泰戈爾著作集》一)

### ※ 在對話浪潮中成立的 SGI

回想起，SGI 成立的 1975 年，正是第四次中東戰爭和越南戰爭的戰火硝煙仍未消散的時期。西方國家召開第一次高峰首腦會議鞏固自己的陣線，東方陣營的中蘇對立則不斷激化，世界處於愈加分裂的狀態中。

正是在這個時候，在 SGI 即將成立之前，我於 1974 年首次訪問了中國及蘇聯，在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下，我與兩國首腦進行了誠心誠意的對話。

當時的日本對蘇聯充滿強烈敵對意識，因此大部分人都指責我身為宗教人士為甚麼要去一個否認宗教的國家。然而，我認為若忽視大約佔世界人口 30% 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是不可能達致世界和平的展望，這種狀態必須早日得到改善。這就是我作為佛教徒的坦誠想法。

首次訪問中國時，我看到北京居民為了防禦蘇聯空襲而

挖建防空洞的情形。三個月後，我在會見柯西金 (Kosygin) 總理時，單刀直入地提出「中國非常擔心蘇聯的行動，蘇聯是否有意向中國發動攻擊？」柯西金總理表示「蘇聯沒有進攻中國的念頭，也沒有孤立中國的想法」。我又訪問了中國，在轉達此一消息的同時，與周總理會面，就加深日中兩國的友好關係和共同為世界的發展而行動的重要性進行了討論。

之後，在 1975 年 1 月訪問美國。在聯合國總部遞交了創價學會青年部要求廢除核武器的一千萬人簽名，並與當時美國國務卿基辛格 (Kissinger) 博士交換了意見。

就在這不斷擴大「對話」的潮流之中，三十年前的今天 1 月 26 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傷亡慘重的關島，雲集了五十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發起了以形成「民眾的大和平勢力」為目標的 SGI。

直到今天，我們一直抱持着「對話才是和平的王道」的信念而不斷前進。

### **\* SGI 將分裂的世界連結起來**

面對走向分裂的世界，我一直通過建立友情與信賴，全力推進平民外交，並於文化教育範疇裏廣泛地進行交流。

超越國家及思想形態，我不斷與各界領袖進行對話。在與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及儒教為首的各種思想、文化、宗教背景的有識之士的交談中，了解到能成為「對話」

這二十一世紀人類至要課題的基礎的，就只有是以「合為善，分為惡」的「人本主義」信念為基準。這也正是我一貫的結論。

我一直本着人本主義推行外交活動，深深地體會到，都必須要對眾多糾紛根源的過激主義、教條主義等作出修正，無論如何也要回歸人本主義的方向。

放眼世界不斷發生的恐怖活動、報復戰爭、民族和宗教糾紛，有可能感到是無從下手的難題。但是，不管怎樣，總需要往前先邁出一步。

威倫斯 (Harold Willens) 曾以方向操作舵 (trimtab) 作比喻 (《阻止核武器的力量》)。方向操作舵是安裝在飛機的機翼及遊艇的龍骨上的輔助用襟翼。通過操縱襟翼可確保飛機及船身平衡穩定，它與主舵相連，也可改變船舶或飛機的前進方向。以一個人的力量去操縱這個方向操作舵是綽綽有餘的。

人本主義的力量就好比是方向操作舵的力量。相對於過激主義、教條主義，人本主義決不是主義與主義的漠然對峙，其原點是人彼此間一對一的、開誠佈公的對話。

從首腦外交到民間外交，真誠對話的本質，正像二十世紀猶太人道主義哲學家馬丁·布伯 (Martin Buber) 所講的於「狹隘山脊」上的相遇，如果稍有不慎的話，就會掉下山脊 (《我與你·對話》)。對話正是如此緊張細心的過程。

對話像一個漣漪，由一波推動千波萬波。對話與人本主義的巨大浪潮，可以包容過激主義與教條主義。而且，最重

要的是通過真心的面對面的對話，耐心地一個一個打開人們所拘泥或被拘束的所有疙瘩。

如此不斷重複努力，結果必然如同方向操作舵那樣，小小的力量就可以支配巨大的飛機及船舶般，修正時代潮流的軌道。

### ※ 造成二十世紀悲劇的過激主義的陷阱

說到過激主義及教條主義，實在是種類繁多。雖然很多人會馬上聯想到如一神教般的宗教，但其實在人類社會中，是隨處可見的。

被認為與過激主義關係不大的佛教，也並不是與過激主義的陷阱毫無關係，下面將會重述此點。

不僅僅是宗教，二十世紀許多殘暴的政治意識形態，也正是這過激主義的俘虜，如此的事例讓人記憶猶新。

在此，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主義的功過」此點。從廣義上來說，意識形態擁有作為「某某主義」的屬性，具有引導人們的思考與行為走向某一方向的功能。也就是說不能否定其有「功」的一面。同時，在不知不覺之中，又具有束縛人們自由思考判斷並使其歸一化的拘束性的一面。偏重這一側面的時候，會使「主義」高於「人」，喧賓奪主，這就是「過」的一面，而且「主義」經常有走向這一負面的傾向。

過激主義、教條主義正是這種不平衡極端發展的明顯例

證，結果是不管是自殺還是被殺，都會把它加以美化、正當化，輕視生命如鴻毛。因此，偏重意識形態的上個世紀，也正是空前面絕後的屠殺世紀。

對此，我所強調的人本主義，雖然也帶有「主義」的字眼，但是它與前面所說的「主義」性質完全相反。

人本主義的最大特徵，就是「主義」的規範並非從外制內，而是人的自由精神從內對外作出主體的判斷。

無可否認，雖然說是以人或人性為基準，但並不是由此便可立刻找到作為判斷基準的行動規範。

當被問及人性的普遍基準時，著名文化人類學家石田英一郎曾苦惱地說，站在文化相對主義立場上，根本是不可能定下甚麼是「普遍」的界線，「結果是自己認為這是人性的，就向着這一方向走下去」（竹山道雄，《關於歷史認識》）。

這看來好像曖昧不清，但亦只能如此表達，這正是內發性、主體性的特質。

### ※ 愛因斯坦的「靈魂的呻吟」

儘管如此，我並不認為這是沒有原則、沒有責任的意思。當人面對嚴峻的考驗時，便會了解到要作貫徹人性的自主決斷是超越想像的困難。

舉個例子來說，身為猶太人，深受納粹非人道的彈壓和暴力迫害的和平主義者愛因斯坦（Einstein），在冥思苦想如

何防止發生最壞局面的時候，終於決定不得不與納粹黨對抗。就當時的心情，愛因斯坦說：「原則是為人而制訂出來，而不是人為了原則而有」（威連·赫爾曼斯，《愛因斯坦·論神》，以下也是摘自同書）。

非常敬仰甘地（Gandhi）的愛因斯坦，甚至曾說過：「如果要我執行命令去殺人，倒不如將我五馬分屍。」由此可見，如果以教條主義去衡量愛因斯坦的信條，可以說他在原則上作了修正。

但是，我所關心的是，第一，假如愛因斯坦在納粹蠻不講理的暴力面前毫不抵抗，結果反而會變成助紂為虐，所以才會迫不得已地做出如此決斷。第二是在害怕納粹先擁有核武器的前提下，認可製造原子彈（不是使用），結果事與願違，招致向日本投下原子彈的後悔，他說這是「一生中犯下的重大錯誤」（金子務，《愛因斯坦·震驚》），充滿罪惡感。第三是出於罪惡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積極投身於廢除核武器，樹立世界政府的和平運動。

這種心靈變化的歷程，每次都是基於其普遍的「人性感覺」而作出的極限的選擇。只有這種追求善的內心鬥爭、精神鬥爭，才是人本主義的真正體現。在法西斯納粹漩渦中的愛因斯坦反覆提出「必須改變人的心」，這正是內心鬥爭、精神鬥爭所不能缺少的因素。

雖然嚴格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愛因斯坦並不能稱

為是「非暴力」的。但是，他這種內心的巨大鬥爭，正是與甘地（不是指甘地主義）的非暴力鬥爭在深層上是相互溝通的。從晚年的愛因斯坦稱讚聖雄甘地是「我們這一時代的最偉大的政治天才」中，可以看出這一點（《愛因斯坦·震驚》）。

想起愛因斯坦的「原則是為人而作出來的，而不是為原則而有人」的這一肺腑之言，可以說是直截了當地表達了人本主義的「黃金規律」。

但是這位二十世紀的巨人的努力搏鬥還未看到結果，我們看得到現實世界是「知易行難」。不管是宗教還是政治思想體制，不知有多少人忘記了這一黃金規律，使人從屬於原理原則，而結果被迫犧牲，令人一想起就毛骨悚然。這種顛倒是非之根源、偏於過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傾向，從某種意義上也可歸咎於人的本性。

佛經中有云：「淺易深難，釋迦所判；去淺就深，丈夫之心也」。人動不動就忘記「丈夫之心」即堅強之心，對某種教義盲從，趨於選擇「淺易」，而墮進「過激主義」的陷阱。利用人誰都有的這一軟弱愚昧的本性，通過阿諛奉承、權謀術數的伎倆，引誘人陷入佛法上稱作三惡道、四惡趣的憎恨、憤怒、嫉妒及傲慢圈套。如此使人的精神變得惡劣、軟弱及愚昧的，正是過激主義、教條主義的反人性所致。

從這點來看，近十多年來，我們 SGI 一直與邪惡的反人性宗教權威對抗的，即是「平成的宗教改革」運動，正是為

了樹立人本主義而進行的鬥爭。反人性的宗教權威以聖職者的權威為擋箭牌，對自身的腐敗墮落視而不見，在權力下妄圖扼殺信徒的靈魂等行為，是最可惡的反人本主義。

如果害怕或是屈服的話，就是人性的失敗。因此，超越一宗一派的問題，為了維護人的尊嚴這一普遍的心情，是一步也不可以後退的。

有關「平成的宗教改革」，已故的滋賀文化短期大學堀太郎校長曾說，這是向隱藏在每個人心中的「權威主義」與「盲從信仰」的挑戰，假如能戰勝，則每一個人都會有顯著的成長。

從此十幾星霜，通過與墮落的宗教權威鬥爭，不管是個人還是整個團體，我們 SGI 都得到很大的成長，為鍛鍊成「堅強之心」而自豪。這種自豪，正是來自我們共同為構築人本主義這一文明論課題而奮鬥過來的自覺和自信。

### ※ 基於佛法的人本主義

我在三年前的倡言中，曾簡要地提及基於佛法的人本主義結構。在這裏，我以此為基礎，作進一步的探討。

人本主義的結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項目。

- (1) 所有的現象是相對的、可變的。
- (2) 故此要培養能看透現象的相對性、可變性的觀察能力，以及不被它迷惑的強韌主體。

(3) 以這種觀察能力、主體為基礎的人本主義，不會根據意識形態、種族、民族而將人「定型化」，進行壓迫或歧視，也不會拒絕對話。

三項中的第一、第二項，也就是看透現象的相對性、可變性的觀察能力，這與佛教哲學中的「三法印」，即「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異曲同工。

諸行無常，萬物在變化。正因在連續的變化，故云「無常」。因此，也沒有固定的、實體的「我」，故此云諸法無我。由這種看透無常現象的觀察能力所帶來的悟境，就是「涅槃寂靜」。這也相通於釋尊原初悟達的「緣起」世界，即森羅萬象都是相互為緣、相互依存而生成，是個多樣性的富饒世界。

問題在於，按照通常對佛教的理解，很難把「三法印」、「緣起」等意識，連結到我作為人本主義歸結的第三項的富有能動色彩的對話與實踐上去。

「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法國哲學家、科學家阿魯貝路·加歌爾 (Albert Jacquard) 在《了解世界的小哲學》中說「對話裏包含着言語和沉默的時刻」，指出和「言語」相比，「沉默」很多時確實是更具有分量。同樣地，佛教主張沉默不是空虛而是富饒的。

以言語中心主義進化至今的西方文明已在各處露出破綻，很多精疲力竭的人們想要從佛教尋求心靈的安慰，這是可以理解的。